

湯志傑

誤打誤撞下的 學術半生緣

坦白說，畢業前我還真沒料到會進社會所。在一般習慣的歸類裡，我算是唸理論出身的，而在過往的印象及傳聞中，社會所較偏好經驗與實證研究的取向，錄取我的機率似乎微乎其微。也不知是何鴻運當頭，我申請的那年，社會所不但沒挑其他呼聲較高的競爭對手，還一反慣例地搶在其他大學前頭辦job talk。我原以為謀教職就像自由市場媒合的過程，可等各機構提供機會了再來選

擇，沒想到完全不是那麼回事。於是，我就這樣幸運地誤打誤撞進了社會所。以中研院豐厚的研究資源，加上無教學負擔，每個人都可研究自己偏好的主題的優渥環境，實係研究者夢寐以求的天堂，我會選社會所自就不意外了——雖然有時也不免從身為公民的角度反問自己，中研院是否該承擔起研究台灣社會迫切需要的特定題目的責任，才不致對不起納稅人。

有次遇到譚康榮，他問我社會所怎沒在我正式任職前先聘我做博士後，平白少了半年薪水，我笑笑地不知如何答他。先前所裡留美的年青同仁也有類似看法，指美國一流大學無不用盡方法爭取人才，認為我該積極爭取自己的權益。雖然我覺得從制度興革的立場來說，這種想法有一定的道理，但身為當事人，想的卻是有人要就不錯了，怎好有非份之想。畢竟，是自己因為學制差異無法馬上繳交畢業證書，才



2009年自強活動明池

無法及時起聘，所上不過照章辦事而已。何況，我本有找不到教職便挑個有時間看書的工作，像是圖書館員或大樓警衛，當個民間學者的心理準備。如今慶幸都來不及了，怎會計較所方有無額外禮遇呢！雖說如今我依然認為生命總會自己找到出路，有更多的社會學博士散佚到民間各領域、各角落未必是壞事，但看到大環境的惡化導致優秀新血難覓棲身之處時，也只好三緘其口，以免勵志不成，反成為已有位置者的風涼話。

進了社會所，我不但成為第一位留德，更是第一位非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成員。由於這樣的背景差異，在大家逕以眼裡看到的世界為世界的情況下，雖讓我在某些方面要吃點虧，但這卻也成了我的優勢或利基所在。我猜，社會所會用我，或許是同仁們覺得不妨以我做個實驗看看。也因此，進所後我一直業業兢兢，生怕斷了非主流研究取向者的後路。沒想到

一晃眼，十多個年頭便過去了，我不知道這個實驗算不算成功，只知自己與社會所已結下不解之緣。這不單因為社會所提供我第一份，也是我迄今惟一有過的全職工作，我的整個學術生涯可謂皆憩泊於此，更緣自個人結婚、生子等人生重大轉折也都在社會所經歷。記得有次得揹著四個月大的老大開事務委員會，還好她不哭不鬧，很給面子地讓我平順開完會。不論是民族所時期風格獨特的舊館，或是曾被汪宏倫評為「高科技、低智慧、無人性」的人文館新大樓，對念舊的我來說，社會所充滿了點點滴滴的回憶。只是沒想到，人才入壯年，離退休仍有段不小距離，便因所上二十年慶的機緣而要開始憶舊了。

猶記剛任職不久，有次在路上遇到 Arthur Wolf，柯志明老師很熱心地要把我介紹給他認識，便說我是「做上古史的」。這恐怕是所裡多數同仁最初的印象，像年紀相近的鄭陸霖更替我取了「夏商



2005年迎新送舊

周」的綽號。由於我的論文是用德文寫的，一般人看不懂，而返台前及剛到任的前一、兩年，我又只用中文發表過博論的兩節，分別談上古聚落到城邦的社會形態轉變，以及封建帝國的形成及其內部分化，難怪大家印象如此。但這樣的氛圍讓我感到戒慎恐懼，覺得好像必須寫些「現代」點的題目。於是，我把博論裡關於戰後政體轉型的部分拿來改寫，希望有助於正當化自己社會學家的身份。

然而，投稿的過程並不順遂。因為自己雖嘗試與台灣既有的研究傳統對話，但並非從慣見的政治社會學的脈絡切入，以致儘管自認從有別於舊典範的視角帶出新的貢獻，在審查人看來卻可能根本不入流。由於我長期關心的，是從歷史的視角釐清今日台灣社會何以如此，預設的主要是中文世界的讀者，覺得把自己的東西寫給洋人看意義不大，或是應設法做出好成績，讓外人主動譯介才對，所以有意無意

間抗拒用外文寫論文。當我的文章連一般同仁認定的兩份台灣主流社會學刊物也上不了時，這下子可就等於宣告學術生命的死亡。面對如此困境，我不免興起趁還能掌握主動時走人的念頭。僥天之倖，就在我盡力最後一搏時，適時得到貴人相助，終能在《台灣社會學》發表文章，也讓我選擇繼續留在社會所。

在社會所，雖然泰半時間得靠自己摸索，對自己關心的，如何發展出觀察及分析華夏文明的內在視野，並由此來考察從中國以迄台灣的發展這樣的大題目，亦少能得到鼓勵與支持，但各種因緣際會下提攜我的貴人實在不少。除了自學生時代起便呵護有加的柯志明老師，與向來寬厚且多少有點愛屋及烏的章英華老師，可稱兄道弟開玩笑的張茂桂老師也曾兩次邀我合作，雖然因緣份不足以致正式計畫未能成形，總算還有緣能與他及章英華老師一起合寫文章。另外，謝

國雄老師和傅仰止老師更同在2005年分別找我參加「群學爭鳴」與「社會變遷」的計畫，開啟我關於社會學史與運動社會學的研究興趣。儘管我猜自己關於台灣社會學史的書寫肯定得罪了不少人，乃至讓自己陷入裡外不是人的窘境，但我想如果能再來一次的話，應當還是會做相同的選擇吧。畢竟，自己從工科轉唸社會學，既不為名亦不為利，無非是想解答自己及社會的困惑。更何況，我在所裡雖屬邊陲，但身處中研院的中心位置，多少可以「偷渡」一些資源。在要有三位所內成員參與發表，所裡才予經費支持的內規下，迄今我雖然只辦過一、兩場跟理論有關的研討會，但至少做理論题目的博士，可以找我掛名指導，開始有機會嘗試申請博士後研究的位置。

鑑於我的工科背景，曾有同仁好奇我怎麼沒做理當駕輕就熟的量化研究。事實上，最初引吸我的本就是社會學的理论觀

點，而非實際的量化分析。由於工科的數理基礎，加上知識論與科學哲學的反省，我認為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有其不可抹煞的價值，但若太過相信這套方法與技術，忘卻這終究是人為建構出來的研究對象，其中充滿各式各樣難以克服的根本問題的話，功反而有可能變成過，因此對此一直興趣缺缺。沒想到在傅老師的邀約下，我竟得重拾已感陌生的量化方法。因為未曾認真跟隨量化技術的進展，以致我關於運動觀念的量化分析有可挑剔與改進之處，但我想自己畢竟成功揭露了東、西方「運動」觀念有異的事實，指出宜先弄清楚從事相關調查與研究的前提才對。

看似與sport相同的「運動」一詞，在使用上涉及所謂「翻譯現代性」的問題，因此這個看似轉向或岔出我以往研究主軸的研究，實則扮演了承接我個人前後研究的關鍵，也就是在過往關於華人社會縱向的歷時研究之外，轉向如何兼顧橫向脈

絡，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理解現代社會的誕生，從而瞭解並找到台灣的定位。

同時，這份研究不但引起知名運動社會學者Heinrich Eichberg的注意與引用，他日後更推薦德國期刊向我邀稿，而我的指導教授Rudolf Stichweh也在讀了我文章後，邀我參加他籌辦的“Variants of Differentiation in the Regions of World Society”研討會，並在徵集論文的宣傳稿中舉我的文章為範例。這樣的經驗讓我更有信心，確定在熟悉西方學界的觀點與討論的前提下，不盲目追隨其問題意識，轉而從自己的社會與歷史中挖掘出可與其對話、交流的本土經驗，是條值得堅持的道路。

循著這樣的思路，在文明化與文人化對舉的框架下，我接著探討華人社會的文明化歷程，點出仕紳社會作為人類第一個後貴族社會的世界史意義。隨後，我開始向現代性的議題攻堅，主張現代社會自始便

是全球格局，希望能在結合系統理論、相互連結的史觀、多元現代性與後殖民反省幾種看似不無扞格的思路之基礎上，重探現代世界社會的形成，提出一套能取代歐洲中心觀的現代性論述。雖然這是條不討好的荊棘之路，不易在既有的學術版圖中找到嚮棲，但基於對知識的真誠信仰，以及身為台灣之子的價值立場選擇，我甘冒這未知的風險，也不願迎合既存的流行立場，玩場安穩的知識遊戲就好。

堅持走自己的路，自然是要付出代價的。最近，收到「族群、民族與現代國家」研究小組論文集的退稿意見，我才驚覺自己試圖從多重結構匯聚的視角，解釋中國民族主義為何在1970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的特定時空下遭國民黨打壓的努力，在旁人眼中卻是「提問方式、問題意識、主要論證」都有問題，「既沒有新的證據支持，關鍵史實也多所錯誤」。感謝小組同仁幾年來的寬容，沒有當面棒喝，讓我

得以享受幾年喜樂的幻覺生活。再次面臨與初入學界時類似的困境，我想責在自己，畢竟是自己選擇了人煙稀少的荒路。在未能成功挑戰既有的史觀之前，這樣的挫折與困頓想必還會不斷出現。

因此，真正的困難與挑戰在於，如何才能不灰心喪志。遺憾的是，本來我還可跟鄭陸霖互相打氣，沒想到他選擇離開這裡。我和他個性其實差異頗大，是在他身體出狀況後才變得比較熟。他雖看似興趣

多元，不斷在換研究題目，外務也不少，但就我認識的他來說，卻充滿了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求真精神，不但是執著於追究根本解的真正學者，更是位可在知識上爭吵，卻不傷友誼的難得友人。我常跟他開玩笑說，我們兩個來認真吵一架，這樣就可各自生產出一篇好論文。可惜這樣的機緣才出現就消失了。

對話的機緣當然也要靠自己創造。自踏入學界來，我便有意識地向不同的期刊投稿，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與盡可能廣泛的學術社群對話，避免自己的東西僅能為特定知識品味與取向的讀者接受。雖然在爭取放寬論文篇幅限制未果下，可投稿的中文期刊有時不免受限，但我始終喜愛並認同 Niklas Luhmann 說過的一句話，「社會學之所以吸引他，係因社會學什麼都可以研究」。雖然自己有時不免得策略性地證成自己社會學者的身份，但嚴格說起來，我從沒有社會學認同的焦慮。因為只要是社



2015年新館研究室

會上發生的事與物，當然就可以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。重點毋寧在於怎樣才能做出好的，不單自己覺得有價值，也能說服別人的研究。我始終認為，好的研究必須先能觸動或感動研究者本人，也就是必定從某個價值關懷出發。因為，沒有激情支撐的理性，是蒼白無力的，而沒有受到理性節制的激情，則是盲目狂亂的。

在選擇走向學術之路後，我便很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。儘管關懷的心始終在，但一來此非我所長，個性又不善交際應酬，二來我認為政治民主化不是萬靈丹，有賴各個社會領域的改革，厚植社會的整體實力，才足以促成真正的進步。事實上，回到各自專業領域裡推動改革，有時反而是更困難的。就像我雖期許自己扮演好螺絲釘角色，但從台灣學界迄今的回應來看，我的努力似乎還無法引起共鳴，贊同我推動的研究方向是重要的。聊堪告慰的是，曾教到一些給他們一扇窗，便有能力自力

學習的好學生。在眼力、體力與整體學術生產力不免隨著年紀下降之際，如何在僅剩的學術歲月裡，證明自己原初素樸的方向感是對的，或至少留下二十、五十年後，後人仍無法輕易繞過的足跡，已是我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。

幸好有在社會所工作的這份機緣，我近幾年得以重拾學生時代練過的傳統武術，既另闢一條深入瞭解華人思惟方式的道路，同時也有助於養生保健，延緩自己在不太健康的學者行業裡耗損的速度，把戰線往後拉長。只是，我雖慢慢摸索出調適身體與工作節奏的方法，卻始終想不出良方面對層出不窮，且速度愈來愈快的各式資料與書籍。以往，我還可隨著手邊的論文寫作暫告一段落，讓桌面短暫地重見天日。但自從搬到新館後，空間雖變大了，我的東西卻也愈堆愈多，不知有多久沒看到桌面了，連螢幕都快被遮住。坦白說，我現在最怕地震。我雖愛書，可並不想它

們跟我做親密的身體接觸。神奇的是，前陣子在家裡遇到一個感覺搖晃蠻厲害的地震，擔心隔天不知要如何走進辦公室，沒想到進辦公室一看，驚訝地發現竟然連一本書也沒掉下來！也不知是我的堆疊技術太好，還是搖晃的方向不對，我只能暗自祈禱，希望以後都能如此。這樣的話，或許在蓋棺論定前，還有機會證明自己研究的價值。

